

论浙江人契约观念的不同特点

陈伟民

(浙江科技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杭州 310023)

摘要: 由于将来的交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当事人的习俗、身份、习惯等因素对契约的制定、履行有很大的作用,由此影响当事人的契约观念。因此,不同的宗族文化造就了不同的契约观念。浙北地区相对较弱的宗族意识使得浙北地区人员之间的默契和依赖的程度低,经济契约中的凭证观念相对较强。受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依附式宗族的影响,温州人相互之间存在着较深的依附关系,这使得温州人彼此之间的交易是重内容轻形式,经济契约中的凭证观念相对较弱。

关键词: 经济契约;人缘契约;宗族意识

中图分类号: F069.9 C91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798(2008)04-0292-05

On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contract concept of people in Zhejiang province

CHEN Wei-m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Because the future exchange exists a lot of uncertainty, the custom, identification, habits of the parties and other fact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rawing and fulfilling the contract, which affected parties the contract concept. Therefore, a different clan culture created a different concept of the contract. Northern Zhejiang region relatively weak clan makes sense in Northern Zhejiang and the tacit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low, the economy contract in the concept of relatively strong credentials. Subject to geopolitic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dependence of the impact of the clan, among Wenzhou People there are deeper attachment, which makes the transaction concept in people in Wenzhou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tents but belittle, and the economic concept of the contract in the relatively weak.

Key words: economic contract; fate contract; clan awareness

契约有多种定义,广义的契约是社会成员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国家等相互之间订立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合同、协议、条约、法律、规定,乃至风俗、习惯等的各种约定。麦克尼尔

收稿日期: 2008-08-20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7CGLJ023YBM)

作者简介: 陈伟民(1959—),男,浙江长兴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认为,契约不过是有关规划将来交换过程的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是将契约限制为承诺,以承诺来影响未来。而在所有社会中,习俗、身份、习惯及其他为人所内化的东西都可以规划未来的交换^[1]。

作为一种习俗,宗族意识影响着人们的契约观念。本文所述的契约观念,指的是在人缘契约和经济契约方面的不同表现。人缘契约是指任何时刻都存在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系列没有明文规定的期望。人缘契约尽管没有作出书面的规定,但却是双方期望的连接纽带。经济契约是指用文字表述的正式书面契约。在宗族意识浓厚的社会中,形成了以关系本位为核心的伦理本位,人与人之间按照“仁义礼智信”联结,个体被筐定在有差等的关系中,宗族成员的行为受制于对血亲群体的集体利益和目标的承诺的规范。宗族成员有责任秉着诚实与其他成员交易和合作,去尊重双方的利益和公平地对待双方。宗族网络通过用好名声和地位来嘉奖可信的行为,而用坏名声甚至断交的手段来制裁背叛行为,从而担当起第三方实施者的形象。契约是规划未来的交换,在关注名声和惧怕流言的巨大压力下,宗族成员的未来行为是可预期的,书面契约存在的必要性也降低了。在宗族意识淡薄的社会中,个人是组成社会和国家的基本单位,社会成员之间经济、社会诸方面关系的程度和行动能力,是由全方位的长期的理性计算所决定,是由长远利益的预期所引起。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成员之间对未来行为的预期不可能像宗族社会中来自社会成员的潜意识,需要通过签订书面契约来规划未来,降低不确定性。

浙江各地有着不同的宗族文化传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宗族意识。以下就浙江南北不同的宗族意识对契约观念形成产生的影响,阐述浙江南北契约观念的不同特点。

1 浙江南北宗族意识的差异

明清时期,随着市镇与工商经济的发展,浙北、苏南一带市镇的规模与数量不断扩张,乡村社会的经济中心向市镇转移,而村落不仅数量不见增长,规模也越变越小。随着市镇的发展,乡村地主向市镇转移,市镇成为乡村经济圈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农产品加工中心,村落的社会财富通过商业利润及地租高度集中于市镇^[2]。在这种情况下,浙北乡村的宗族意识开始淡薄,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浙

北村落内部的宗族组织已经解体,宗族的血缘关系纽带已经大大松弛,家庭个体化,独立化已经完成,村落成为各独立家庭的聚居地,村落的地缘关系高于血缘关系^[3]。例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浙北的海宁,多数宗族并无族谱,少数保留族谱的“大宗富族”,其最晚的延修时间是民国初年。在52个村落中,仅5~6部族谱保留到解放后,而幸免于文革之灾的只有一部。续修族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该地区族谱的缺乏,既反映了宗族意识的淡化,也说明宗族共有经济的薄弱^[3]。

温州是一个宗族势力很强的地方^[4]。温州宗族组织盛行的根本原因是温州为一移民社会。按照史晋川等人的研究,温州的土著居民极少,今天的温州人大多是由福建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平阳、苍南两县,说闽南方言的人口占1/2~2/3,即使是说温州话的温州其他地区,亦有不少闽南人迁入^[5]。大批福建移民移居温州对温州宗族所产生的影响来自两方面:一方面闽南地区的宗族意识非常强。明中叶以后,闽南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导致明清闽南宗族势力特别强盛,宗族成为影响当地社会最重要的组织^[6];另一方面,移民到温州定居后,首先要防备原住民的攻击,还要与不同移民群体争夺生存资源,站稳脚跟后,又必须组织较大规模的人群建造水利灌溉系统。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组成坚强的社群团体。福建移民中,数量最大的来自闽南的漳州、泉州地区^[5]。因此,温州地区继承了漳州、泉州地区宗族的特点。闽南的漳州、泉州等地的宗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依附式宗族^[6]。依附式宗族的基本特征,在于族人的权利及义务取决于相互支配或依附的关系。由于族人之间的相互支配或依附关系一般是在聚族而居的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可以说,依附式宗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

体现温州地区宗族意识浓厚的一个标志是温州地区的公田、祠堂等数量比浙江其他地区多。在浙江北部基本上一无公田,二无祠堂,这种现象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十分普遍。而在温州乐清市的虹桥镇,直到1949年土改前夕,全镇仍然有宗族公田71.89 hm² (1078.41亩),占镇内土地的13.4%,并且宗祠也随处可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宗族意识的复活,乐清、永嘉等地重修庙宇、祠堂坟墓,重修族谱,以及看风水、祭祖奉神等风盛一时。在乐清虹桥,不仅解放初期或在“文革”时期被捣毁的庙

宇大部分修复,而且许多村还建起了新庙宇。而此风更盛的永嘉县,仅黄田乡在 1989 年就重建祠堂 33 座。永嘉县桥头镇,在 1980—1983 年的 4 年间,叶氏等 17 个大姓就重修族谱 53 册^[7]。

2 浙江人人缘契约观念的差异

受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依附式宗族影响,温州人之间存在着较深的依附关系,这表现在“温州人圈子”对温州人经济、社会交往的影响上。温州人作为一个共同体,外出时都认“温州人”或者“温州话”。即使在温州本土,是否温州籍或者会讲温州话也竟然成为信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人把经常在一起的感情相投的人,称为“朋友”。朋友之间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有着某种天然的合契。因此,温州商人之间的协作意识非常强。商会,作为协调商人与商人、商人和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的民间自发组织,其数量的多少,是体现一个地区商人协作程度的一个标志。至 2005 年,温州大大小小的商会共有 500 多家,几乎覆盖了所有的行业^[8]。遍布各地的商会组织,保证了温州商人不论到世界上哪个角落,都可以通过温州人开展当地的贸易。近年来数亿资金通过合股的方式在数日内聚集,已是屡见不鲜的温州故事。如此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如何保证安全回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遍布各地的温州人,得益于“温州人圈子”编织的庞大而灵敏的情报系统。一位在新疆经商的温州商人透露,他第一次到新疆投资时,从下飞机到签下 7 000 万的购并合同,不过寥寥数天时间^[9]。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作出投资决策,依靠的就是当地的温州人提供的全面信息。

相比之下,浙北地区商人相互之间的默契和依赖程度比温州商人弱。这表现在:第一,浙江北部商会的数量与温州相比要少得多。例如,嘉兴市人民政府在 2004 年作出的行业协会规划是,到 2007 年全市各类行业协会达到 100 个;到 2005 年底,行业协会入会会员数量要基本达到该行业企业数量的 20% 以上。嘉兴规划 2007 年的行业协会,不论是数量还是覆盖范围,均比 2005 年的温州低很多。第二,浙北地区商人齐心协力应付危机的意识较弱。2005 年欧美等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数量提出“特保”“设限”申请。按照国际惯例,设限国在提出设限申请以后,都有大约一个月的“公众评论期”,主要是给相关的利益群体,包括设限国生产商、销售商、零

售商以及被设限国的生产企业以表达的机会。这是中国企业上书美国纺织品执行委员会、欧委会表示抗议的好机会。作为长三角地区丝绸和毛纺重镇的嘉兴,是遭受本次“特保”“设限”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理应积极提交对设限的抗议,但嘉兴全市的 1 000 多家纺织品出口企业普遍表现出“搭便车”心理,响应的不到 100 家,并且真正提交书面抗议的企业不超过五六家^[10]。

3 浙江人经济契约观念的不同表现

受宗族意识影响,人际因素对温州人在经济契约的签订和履行有很大的作用。以下几个例子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这种情况。

在财产出现产权纠纷时,温州人不是依赖契约而是依靠宗族首领的权威来解决产权的归属。如乐清《柳市镇志》:凡族人发生争田斗地等纠纷,均由族长召集会议,判定是非^[11]。永嘉《桥头镇志》:平日遇有事情都叫亲房来商量,比如分家、田业房产、经济矛盾及一些民事纠纷等,均由亲属出面调解^[12]。永嘉县《瓯北镇志》:族人发生争田争地等纠纷,由族长召集会议,进行判决^[13]。在资金的借贷方面,缺乏书面凭证。2000 年 9 月 24 日,时任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在浙江图书馆举行的一次经济论坛上所作的报告中讲到,温州企业相互之间借钱没有字据,即使是上百万元的资金的借贷。《中华工商时报》也有报道:温州民间融资手续非常简便,企业需用一两百万资金,凭借亲友间的个人信用,甚至连借条都不用打^[14]。

在温州产业结构中占比重较大的产业如服装、皮鞋、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均为成熟产业,即交易的不确定性低、交易的专用性不强,因此,温州企业在契约的制订和履行中不需要采用所谓的“应变”措施,但在交易中实际采用的是关系契约。以下所列举的温州打火机行业的例子从某一个方面反映了温州企业在契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打火机行业与服装、皮鞋、低压电器等行业有很多相似的特点,例如均属轻工产品,产品的科技含量都不高,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因此,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契约观念可以折射出温州其他行业的契约观念。

2002 年 6 月 28 日,欧盟宣布对中国(主要来自温州)等东南亚国家的可充气打火机实施反倾销调查。面对欧盟的反倾销,温州烟具协会领导人周大虎等带领温州 15 家打火机企业进行应诉。反倾销

案起诉的条件有两条:一是对方价格有倾销嫌疑,二是对己方的相应厂商造成损害。而应诉的要点同样是在这两点上做文章,其一要证明产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形成的,其二是证明自己的产品并未对相应的厂商造成损害。应诉时只要证明其中一点就可以证明自己没有构成倾销,而第一点市场经济地位的确认通常更容易操作。虽然在国内温州企业被认为是最为市场化的企业,但在举证阶段却很难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基础管理数据缺乏,没有完善的书面契约证明^[15]。由于相关证据的缺乏,在打火机反倾销应诉中,最为有力、也最轻车熟路的诉讼途径被堵死了。喜欢现金交易,喜欢口头协议,这些让温州商人津津乐道、自以为可降低成本的传统做法,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却往往成为致命的弱点。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人际契约观念在温州打火机行业中具有普遍性,因为敢于参与应诉的这15家打火机企业在温州打火机行业中属于财务制度相对规范的,这15家打火机企业尚且缺乏书面契约凭证,温州其他500多家打火机企业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相比之下,浙北地区书面契约观念要强。浙北地区自明清以来,市镇与工商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心由乡村向市镇的转移,带动了经济契约的逐步成熟。随着江南城镇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私人房地产所有权逐渐成为江南城镇土地所有权构成的主体,私人房地产所有权的转让数量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增加。因为买卖房地产是一种产权转让,必须立有买卖契约,所以经济契约从明清开始就已被人们所熟悉。在商品交易中,经济契约也逐渐被交易者所接受。据吴自牧《梦梁录·米铺》记载,客商将产于苏湖常秀淮广等地的大米大量贩运到杭州之后,由专门的“米行”批发给各家米铺,米铺并不立即支付价金,而是“约定日子”清结价款^[16]。契约在解决纠纷方面也发挥着作用。据《绍兴市志》介绍,民初绍兴县城隆教寺内的“兰亭”茶室,就是民间书写诉讼文书、“私了讲和”的处所。诉讼双方,多愿私了,不愿涉官,涉官则两败俱伤。一经调解完成,就在茶店对面的王顺兴酒店设宴一席,让诉讼双方在席间握手言和,照章办事或中止契约(合同)^[17]。契约在资金借贷方面不可或缺。例如,嘉兴民间借贷要正式签约立据,书面协议内容日趋齐全,借贷双方姓名、金额、用途、利率、期限、违约责任等一应俱全,

并有中保人,数额较大的还需要以商品房、铺面等作抵押^[18]。

订单农业,也称合同农业或契约农业,它是指农户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按照与农产品购买者签订的合同,组织安排生产的一种农业产销模式。订单农业通过契约的形式,把购销双方紧密地连结起来,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按照契约的规定,完成生产经营中产销活动的全过程。一个地区订单农业开展的情况如何,也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契约观念的状况。

目前浙北的湖州、嘉兴、萧山等地的订单农业发展良好。嘉善县订单农业产值已占嘉善农业产值的13%,成为当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一把“利器”^[19]。湖州市依托龙头企业、专业批发市场发展订单农业,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专业批发市场与农民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订单农业发展迅速^[20]。杭州萧山区2006年共签订粮食、蔬菜、水果等各类订单合同1412份,订单金额12357万元,订单履约率达80%以上^[21]。

而温州的订单农业订单合同不规范,订单农业的质量不高。从订单文本看,规范性合同少、意向性协议多,存在着内容不全面、格式不规范、标的的不够具体、责权不明确等问题,可操作性不强,有的甚至是口头协议而无书面合同,给合同履行带来难度。由于签约双方没有认识到“农业订单”是双方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导致订单农业履行艰难,2001年完全履行的只有1/3^[22]。

4 结 语

综上所述,浙江南北不同的契约观念对各地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同的作用。注重人缘契约的温州,达成和履行契约支付成本低,经济起步快,温州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即具相当规模;注重书面契约的浙北地区,能够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这几年招商引资成绩显著。

参考文献:

- [1] 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 [2] 林济.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3]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 [4] 李进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考察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5] 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 [6]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 [7]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98.
- [8] 张和平,石朝格.温州 500 家行业商会调查:从草根组织到底荫大树[N].中国证券报,2005-09-24(B01).
- [9] 陈剩勇,马斌.民间商会与地方治理:功能及其限度[J].社会科学,2007(4):58-71.
- [10] 贾林男.商会无作用谁缺席纺织品贸易战[N].中华工商时报,2005-09-06(2).
- [11] 乐清市柳市镇人民政府.柳市镇志[M].合肥:黄山出版社,1998.
- [12] 永嘉县桥头镇人民政府.桥头镇志[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9.
- [13] 永嘉县瓯北镇人民政府.瓯北镇志[M].合肥:黄山出版社,1997.
- [14] 朱小央.温州存款负增长,民间借贷价格上升[N].中华工商时报,2004-05-18(2).
- [15] 郑作时.周大虎“灭火”[J].南风窗,2003(20):46-49.
- [16] 吴自牧.梦梁录·米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 [17] 任桂全.绍兴市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18] 朱雪明.农村民间借贷呈现新特点[N].中国财经报,2007-01-30(3).
- [19] 徐雪娟,金鹏.“小订单”成嘉善农民致富“支票”[N].嘉兴日报,2007-04-01(2).
- [20] 李志超,朱月林.我市“订单农业”发展现状的调查与思考[J].湖州农业工作简讯,2002(42):23-25.
- [21] 袁少平.订单农业让农民尝到甜头[N].萧山日报,2007-05-08(2).
- [22] 潘凤钗.温州市订单农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的探讨[J].浙江现代农业,2003(2):33-37.

(上接第 268 页)

参考文献:

- [1] 范艺,刘雄英,丘水生.混沌加密与常规加密复合的图像保密通信系统[J].计算机工程,2005,31(20):44-45.
- [2] 雷瑛,李会方.一种基于二维傅里叶变换的数字水印算法[J].飞机工程,2006(4):45-46.
- [3] HAE Yong Kim, RICARDO L de Queiroz. Alteration-Locating Authentication Watermarking for Binary Images[J]. IWDW 2004, LNCS 3304, 125-136.
- [4] HAE Yong Kim, RICARDO L de Queiroz. A PUBLIC-KEY AUTHENTICATION WATERMARKING FOR BINARY IMAGES [J]. IEEE Int Conf Image Processing, 2004(4):3459-3462.
- [5] VENKATESAN R, KOON S M, JAKUBOWSKI M H, et al. Robust image hashing [C]//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mage Processing, Vancouver, BC, Canada, 2000:664-666.
- [6] 吴金海,林福宗.基于数字水印的图像论证技术[J].计算机学报,2004,27(9):1153-1161.
- [7] RICARDO L de Queiroz, Karen M Braun. Color to Gray and Back: Color Embedding Into Textured Gray Images [J].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2006, 15(6):1464-1470.